

图书馆与《资本论》创作之路

——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足迹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提起马克思，人们不能不想到恢弘的巨著——《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科学成果，它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著作。从 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经济理论著作，有《资本论》这样长久的生命力，掌握这样众多的群众，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起过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

打开厚厚的三大卷《资本论》，人们往往对它的严密的结构、透彻的论证和生动的表述惊叹不已。这座宏伟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是马克思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为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呕心沥血地工作了整整 40 年。为查阅与《资本论》写作有关的资料，图书馆成为马克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图书馆

1847 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受共产主义同盟的委托，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撰写了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放下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投身于革命的风暴之中。欧洲革命失败后，在法国的无产阶级受到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法国政府不允许马克思继续留在法国。

1849 年 8 月底，马克思被迫只身抵达伦敦，一个月后他的夫人燕妮和 3 个孩子才到伦敦与他团聚。在此后 30 多年的岁月中，马克思一直生活在伦敦。伦敦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故乡。

到伦敦后不久，马克思就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活在伦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关系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伦敦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达 250 万；伦敦凭借其拥有的如英格兰银行和证券交易这样发达的贸易和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伦敦是观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演化的最理想的地方。

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英国在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的 200 年间，出现过像配第、斯密和李嘉图这样一批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1823 年李嘉图逝世后，围绕斯密、李嘉图学说展开的热烈的理论争鸣、由此衍生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门派，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缩影。50 年代初的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无可争议的

心。在这种理论争鸣和学派林立的气氛中，马克思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住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脉搏。

另一个吸引马克思来到伦敦的原因是伦敦拥有一座全欧洲最大的博物院图书馆。他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因此，从1850年5月起，马克思开始研读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几乎是全欧洲最丰富、最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这时，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重视图书馆的利用，这是因为马克思深感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虽有一定的研究，但还不够精深，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更是感到不足。这与马克思所学的专业有关。

在中学毕业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少年马克思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追求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的人。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马克思选择了法律专业，但他感兴趣的是历史和哲学。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经常泡在

大学图书馆里，钻研了堆积如山的法律专业文献，大大超过了正常课程指定的参考书籍，但他并不满足于掌握一些零星的事实原理，他还渴望依靠哲学的帮助，能够真正地吃透这些东西。马克思感到，自己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这就是要全力为哲学研究而奋斗。

1841年马克思大学毕业时，提交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并以这篇论文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本打算在波恩大学担任哲学副教授，并参与创办名为《无神论文库》的刊物，但是，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上台后，开始迫害进步教师和学者，马克思不得不抛弃留校任教的意愿。青年马克思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了反动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

1842年春，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莱茵报》是由新兴资产阶级创办的一份报纸。同年10月，年仅24岁的马克思任该报主编。这时，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按照德国的传统习惯，森林原本是公共所有的，农民可以到森林中去砍伐林木、拾捡枯树枝。但是，到19世纪初，封建地主开始大肆掠夺森林、侵占原先的共有地。陷于贫困中的农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来进行斗争。所谓的“林木盗窃”的诉讼案即由此而生。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一个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的许可，农民不得采伐林木，否则按盗窃林木惩处。政府要求各省审定通过这一法案。1841年，莱茵省议会会议对这一法案进行了讨论。最后，莱茵省议会不仅决定对砍伐林木者给予严惩，而且还变本加厉，把拾捡枯树枝也当作盗窃林木的行为，同样给予严厉的惩罚。因此，所

谓的“林木盗窃”问题，实质上是剥夺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莱茵报》应该为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辩护。

于是，马克思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对莱茵省议会通过的法案作了抨击。他指出，把农民拾捡枯树枝视为盗窃林木，这是荒谬的；农民拾捡枯树枝是一种合法的占有，绝不是什么盗窃；莱茵省议会通过这类法案，说明议会已沦为地主阶级私人利益的工具。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还一无所知，因此，对这一侵犯贫苦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还不能从经济关系上进行剖析，还只能从法学的角度加以抨击。这件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推动了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推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动因，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需要。当时，马克思在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最初考察中，已经看到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不具有现实性。他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流于种种“实际经验”的做法，主张对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他也反对对流行的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著作妄加评判，主张在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科学批判。为此，马克思迫切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将为他科学地阐述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必不可少的前提。

马克思以他的犀利的笔锋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和专制统治制度，使得普鲁士政府急忙作出立即禁止《莱茵报》继续出版的决定。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这时，马克思也愿意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致力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此后，他研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其中既包括当时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

。李嘉图的著作，又包括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赛姆·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更细致地研读了他的终生挚友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1847年1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对他这一时期形成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表述。在政治经济学上，《共产党宣言》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揭示了资本同雇佣劳动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及这两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根本性质和必然走势；阐述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如果从1842年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接触经济问题、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起，一直到1883年3月马克思在放着一大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的桌边，坐在安乐椅上逝世时止，他整整用了40年的心血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乍看起来，人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只是一门普通的社会科学，并不一定十分复杂。但是，就是这门政治经济学，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科学理论基础，范围极其广泛。各国都有许多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许多人一生只能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并且不一定能够研究得很透彻。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马克思四十年如一日，克服无数难以想像的政治上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困难，去从事这一研究的？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的这句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登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极其艰辛的脑力劳动。科学上任何领域中一项伟大的发现或一个重大问题的突破，甚至一个萌芽状态的设想，往往需要科学家锲而不舍地连续探索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付出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从 1850 年 5 月起，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里，就经常出现马克思的身影。图书馆内不仅有十分丰富的图书和资料，而且这里布置得十分舒适，冬季有取暖设备，夏季有通风设备。马克思只要一走进图书馆，大脑就立刻兴奋起来，一切不愉快的琐事立即烟消云散。1851 年 6 月，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

从早晨 9 点到晚上 7 点，我通常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 6 至 8 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不可避免的。

无论酷暑严冬，马克思白天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埋头看资料，直到星月当空才离开阅览室，晚上回到家中还要坚持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一生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工人的 8 小时工作制斗争，但自己却往往工作 16 个小时以上。马克思曾经诙谐地自嘲说，他采用的是 1849~1850 年英国狗厂主们实行的换班制度，白天去图书馆，夜间写作。他在阅览室读书的时候，总是坐在 D 行第二号座位。由于他读书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天长日久，他座位下的水泥地上竟被磨去一层，在那里深深地留下了他的

“足迹”。

马克思一刻也离不开图书馆。有一次，图书馆为了修缮房屋，需要闭馆一个星期。马克思失去了一个星期在图书馆从事研究的机会，感到十分可惜。当他由于别的事务要短时离开伦敦的时候，更感到图书馆对他是多么亲切，多么富有吸引力。有一次，他要到德国柏林去。他在安排自己这个行动计划时，写信给柏林的拉萨尔说：“伦敦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虽然我在这个大巢穴里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马克思非常鄙视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当时流亡到伦敦的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高谈阔论，整天忙碌于狂热地空谈革命中。马克思也鄙视那些试图靠从天上掉下的灵感来研究问题的人。他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正是他勤奋钻研、不畏艰险、努力攀登科学顶峰的真实写照。

为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沿着陡峭山路不断攀登，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首先是家庭的不幸，1852年4月，马克思的1岁的小女儿不幸病逝，当时，马克思一家穷得连埋葬女儿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冒雨出去借钱，借得2英镑，买了一口小棺材，才得以安葬。1857年的冬季是英国罕见的严冬，经济上的极端困难使马克思一家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此外，疾病、死亡也常常朝他袭来。引起马克思的疾病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他拼命地工作，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了生理限度所致。长期的劳作，使马克思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起：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

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变，医生要我去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有时疾病痛得他无法坐着写字，他就躺着继续写。有时他坐在图书馆看书，突然两眼发黑，头痛难忍，胸部闷得慌。他说：“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他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到了书稿上，总是念念不忘书中的一章一节。甚至夜里说梦话时，也提到书的一些章节。1867年4月，马克思对朋友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当时，与马克思经常接触的人们，也无不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时期马克思刻不容缓地抓紧时间学习的情景，以及马克思毫不留情地逼他的朋友们学习的情景：学习！学习！这就是马克思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无上命令，就在于他以身作则。这位不停地顽强工作的智者哪怕只是看你一眼，你都会觉得他在命令你学习。

然而，就是凭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崇高信念，凭着对科学事业的坚韧不拔的追求，凭着普鲁米修斯的巨大的牺牲精神，马克思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坚强的毅力从事他的研究工作。

为写作《资本论》辛勤劳作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可谓是精益求精。在 1850 年之前，他已经研究了欧洲 22 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他曾向恩格斯透露，准备在两个月之内写完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听了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后很高兴，他早就希望马克思能够尽快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写信向马克思表示祝贺。可是，马克思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部利用电力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专著。马克思立即停止了写作工作，仔细研究这本刚刚出版的著作。马克思就是这样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新发现的科学理论的。只要他发现有一本他认为需要研究的著作，在没有深入地研究之前，他是不会动笔写自己的著作的。

在正式动笔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图书馆里广泛搜集、鉴别、研究各种文献资料，凡是与他论述的问题有关的资料在没有完全看完以前，他决不动手写作。拉法格回忆说，马克思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权威的权威人士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花多大的功夫。即使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图书馆去查阅证实。例如，为了写《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工厂法的二十四页文章，马克思竟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而这些蓝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许多议员们只是把它们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武器的威力。因此，直到 1863 年 8 月到 1865 年底，马克思才正式开始以《资本

论》为标题，撰写了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流通过程、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为主题的一系列手稿。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终于在汉堡出版。这部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著作，一出版便很快地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1867年以后，马克思继续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辛勤劳作。1870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又写了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7个手稿，在写作第二卷中“生产时间”这一章时，本身只有十页的篇幅，马克思却在图书馆里查阅、考证、最后在著作中运用了五个国家的炼铁、纺织、制陶、造酒、制革、漂白、造纸、畜牧、植物栽培、饲料种植以及轮作制等详细技术资料。到1870年，马克思已经52岁了，并且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好几门语言，但是，他坚持要学习俄语，并且很快地学会了俄语。他用俄文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原版著作，在他的《资本论》中应用了许多俄国经济资料，特别是俄国原始式的劳动组合方式方面的资料。为写作《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理论，他又来到大不列颠博物院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他查阅过的有关农业统计资料的报刊就有两个多立方米。他还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利润、利润转为平均利润问题，以及银行、信用和股份资本等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用查阅的有关的图书资料共计1500多种，其中约有800本著作的有关内容在《资本论》中被引用，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也有100多本。可以说，《资本论》中的每一个原理，都是从大量的实际材料中概括出来的，都是对浩瀚的书籍、文献和报刊进行研究的结果。

正因为马克思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有渊博的学问，才使得他能够把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写成一部完整的精美无瑕的艺术品——《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在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不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还是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上，《资本论》都占有显著的地位。

140 多年过去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里，至今还保留着马克思坐过的座位，从阅览桌到借书处马克思不知往返了多少次，地板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这一串串足迹是否也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启示：

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

图书馆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据点，是为科研提供文献资料的基地；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必须从收集、掌握、熟悉图书资料开始，科研工作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取得，从来都离不开图书文献资料，马克思也不例外。

拿起每一本新书就像拿起一件武器

——列宁在革命实践中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掌握人类知识所积聚起来的东西。

——列宁

书籍总是伴随着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书籍犹如战斗中的武器，永不离手。

对列宁来说，书籍、杂志和报纸不仅是知识、情报和美的享受的源泉，而且首先是纯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列宁把读书作为科学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活动，作为国家需要。因此，在自己的一生中，列宁对书籍总是孜孜以求的。

当列宁在自己的藏书中找不到对所需要的问题的答案时，他总是想到图书馆。不论住在什么地方，他总是能挤出时间到图书馆学习，也不管是路途多么遥远或是时间多么不足都阻碍不了他。

列宁一生踏遍了国内外 200 多个城市，所到之处他都能腾出时间和寻求机会去图书馆学习。列宁的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喀山大学图书馆接受 第一次革命洗礼

喀山，处在欧洲通往亚洲的交通线上，城市上空耸立着的 40 多座东正教教堂的钟楼和大约 20 座清真寺的尖塔，显示出了这个城市兼有欧亚两大洲的风俗特色。

这里有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石头垒砌成的两层大楼，装饰着粗大的伊奥尼亚式的圆柱和锯齿形的飞檐，楼的正门面临大街，有三扇宽阔的大门，门上方镶嵌着四个大字：帝国大学。

1887 年 8 月，喀山大学又迎来了新同学的到来。

开学了，一位个头不高，身体却很结实，长着一头棕红色波浪型卷发的少年按照规定第一个把付清学费的收据交到了办公室，然后他领取了一张出入证。随后，他穿上了统一配发的带有金属纽扣的大学生制服，戴上镶着蓝边的制帽，向法律系走去。

这位翩翩少年就是年仅 17 岁的列宁；17 岁的列宁就这样开始了大学生涯。

从辛比尔斯克考入喀山大学的列宁，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他很快以饱满的学习热忱投身于知识的海洋，他刻苦攻读俄国法学理论、罗马法学史、神学、法学通论和英语等课目。

早在中学时代，列宁就非常喜欢读书，并养成了积极的阅读风格。中学时代列宁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他叫阿波龙·柯林夫斯基。每当列宁来到柯林夫斯基家时，他就直奔书柜，爬到一只高凳子上守着书柜开始翻阅书籍，他读

得非常入迷，忘却了世界上的一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当同学喊着他的名字，叫他下来同大家一起玩耍时，坐在高高的凳子上的列宁一手拿着书，一手向同学摆着说：“去，去！”为了不让同学再纠缠他，他甚至塞住耳朵。

进入大学后，列宁依然保持了这种积极的阅读风格。他是喀山大学图书馆的积极读者。这所建于 1806 年的图书馆，有着极其丰厚的藏书。1886 年图书馆收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本。列宁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这部不朽的著作。

当列宁在图书馆里第一次掀开这部科学巨著时，他马上便被吸引住了，感到全书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家里，父亲经常把孩子们带进自己的书房，给他们讲有关穷人的故事。饱经风霜的保姆也不时把自己从前在边扎省一个地主家当农奴的悲惨遭遇倾诉给孩子们听。父辈们所讲述的这一切，使尚在童年中的列宁就爱好思考周围生活的一切，他很明确爱谁、恨谁。一次，父亲问孩子们：“为什么要讲穷人的故事？”列宁回答说：“因为他们比财主好，比财主快乐。”说着，把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唱起了保姆教的歌：“财主大混蛋，搂着钱柜常失眠，穷人贫如洗，唱唱乐乐多欢喜。”

今天，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书中不仅找到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坚信最革命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这支革命大军的存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新的、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取而代之。

然而，正当列宁在知识的宝库中遨游时，沙皇政府却以谋刺亚历山大三世一案的主要参与者是大学生为借口，在喀山大学里对学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派教授们实行了一系

列严厉的限制措施。大学里到处布满了警察和暗探，不论是谁，只要稍有一点自由主义的言论，很快就会被人告密，接着就是搜查和逮捕。

面对沙皇政府的反动专制制度，列宁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勇敢地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发出了坚决抗议反动的警察制度的演说：“同学们，难道我们就不能起来保卫我们已经被践踏了的权利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向飞扬跋扈的反动派提出抗议吗？我们相信喀山的同学们，我们呼吁你们起来，在校内进行公开的斗争！”

列宁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地拨动着在座的每一个学生的心弦。

这年冬天，在列宁的带领下，学生们集合在一起来到校长办公室。然而，学生们的公正要求非但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受到了校方的警告：“如果不解散，就要将你们全部交付警察或军队处置。”当校长宣布这一命令时，学生们纷纷把自己的出入证扔在桌上。列宁是第一批扔出入证的学生。

当天深夜，刮起了肆虐的寒风。在自己的住所里，列宁伏案起草一份给校长的辛辣的“申请书”：“在目前这种大学生活条件下，我认为不可能在贵大学继续我的学业，恳请阁下发布相应命令：将我从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名单中除名。”实际上在这之前，列宁已经被大学当局开除了。

风夹着石子敲打着结了冰的玻璃窗。突然，屋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门刚被打开，一伙警察便闯了进来，列宁被押走了。

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警察分局长坐在马拉的雪橇里，斜眼看着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人：

“你还是个毛孩子的大学生，为什么要起来造反？年轻人，

要知道在你的面前是一堵墙，你不是在用脑袋往墙上撞吗？”

“是的，一堵墙，但是已经腐朽了，一推就倒，我们可以从上面跨越过去。”年轻人坚定地回答。

夜，是这样的宁静，马拉雪橇从已经沉睡的喀山市民的房子旁边飞驰而过……

在萨马拉中央图书馆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列宁在莱舍夫县的科什基诺村度过了他的流放期，于 1888 年 10 月，回到喀山。次年 5 月，列宁与全家一起移居到萨马拉以东 50 俄里的阿拉卡耶夫卡村附近的田庄。

这是一个偏僻但很幽静的村庄。它使列宁有条件在这里潜心读书，系统地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一条长着茂密椴树的林荫小径旁，列宁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幽静的“书房”——在草坪上安置一条长凳和一张桌子。

每天吃过早饭以后，列宁便抱着一大堆书，准时赶到这里，仿佛有一位严师正在这里等待他似的。吃午饭以前的整个时间，他都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读书。

在一大堆各类书籍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桌子上的那本厚厚的敞开着的《资本论》。上面已划了好多红蓝两色的条条杠杠。列宁在这个幽静的“书房”里又重新开始了对这部著作更深入的研究。

列宁把《资本论》的每一页都反复地读上几遍，他还广泛地搜集了俄国农民生活和城市无产阶级状况的材料，仔细地分析本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从而更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结论。